

茅家琦 著

历史
与
思想
论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项目 -

茅家琦 著

历史与思想论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与思想论集 / 茅家琦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305-16704-1

I. ①历… II. ①茅… III. ①史学—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489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历史与思想论集

著 者 茅家琦

责任编辑 李鸿敏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印张 46.75 字数 707 千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6704-1

定 价 19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自序

一、长期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

我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和绝大多数同行一样，一开始我就相信两个观点：一是在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二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以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并形成一条“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律”。长期以来，我又感到这两个观点之间存在着难以解释的矛盾：“真正动力”与“历史发展的周期律”之间的矛盾。既然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就不应该形成“历史发展的周期律”；既然出现“历史发展的周期律”，就不能说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这个问题困惑我三十年。“文革”结束以后，我开始意识到思想在构铸历史中的巨大作用。我在研究“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问题时，发现思想对城市近代化的作用。当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两位丁忧在籍的状元陆润庠和张謇分别在他们的家乡苏州和南通创办近代工业。对这一项工作，陆润庠和张謇具有不同的思想理念。陆润庠志在做官，无意创办近代工业，在苏州应付一番，守制期满，立即返京做官去了。苏州仍然是“寓公”养老送终的好地方。张謇认识到创办近代工业的重要意义，并将毕生精力用在南通近代化事业上。南通成为当时中

国的模范县。

20 世纪 30 年代常州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大成纱厂现象也引起我的重视。

30 年代，国内棉纺织工业面临着整体萧条。在地理条件远不如无锡、南通的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却成为一颗明星，创造了奇迹，带动了常州城市的发展。1930 年，刘国钧集资 50 万元，盘下了大伦布厂，改组为大成，当年就获利 10 万元左右。从 1930 年到 1937 年，七年中股东红利及职工分红共支出 100 万元；大成拥有的设备，纱锭从 1 万枚增加到 9 万枚，布机从 260 台增加到 3 000 台，漂染设备从零发展到 5 000 匹布。大成公司取得如此引人瞩目的成就，关键在于经理人员思想的能动作用。总经理刘国钧认为：一个工厂要靠多出货色、出好货色、出比别人便宜的货色，才能发达；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第一流的技术，第一流的管理，关键则在有人才。他出任总经理后，第一件事就是不惜重金聘请贤才。他毅然以每年 5 000 元的高薪聘请一位知名专家主持工务。当时，5 000 元相当于大成的注册资本 50 万元的 1%；相当于当时 60 个熟练工人的工资。

这一历史事实，不能不引起我对思想作用的思考，到 20 世纪 90 年代，我参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审稿工作，解读了许多专家的著作，我的思想认识又有了发展，逐步形成一种观念：思想合力构铸历史。这解决了困惑我三十年的难题。

二、弘扬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

思想的内容包括哪些？我认为思想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人生论与认识论。

人生论的精华是人文精神。具体地说，就是尊重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人生论的糟粕则是由人的欲望膨胀而形成的贪欲。

认识论的精华是理性精神，主要是思想方法方面的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上，对思想方法，即认识论的研究十分薄弱。按照严复的说

法，就是“心成”之学统治着认识论。当年严复从西方引进了“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学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他也就“到此为止”。归纳出来的“公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完整”的，严复就没有再考虑了。他没有进一步研究“假说”、“证伪”、“证实”方法的运用问题。这些方法恰恰是弘扬理性精神不可缺少的思想方法。

人生论和认识论是构成人的思想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弘扬人文精神、抑制贪欲，弘扬理性精神、克服愚昧，是历史创造者和历史研究者所必须具备的品质。

三、史实求证之一：三位皇帝和三次农民战争

三位皇帝是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

秦始皇的贪欲极度膨胀，大肆挥霍天下财富，压榨民脂民膏，他企图使自己的子孙世世代代做皇帝，采取了暴力统治方式。结果，民不堪命，二世而止。

汉武帝登上皇帝宝座以后，贪欲膨胀，大肆挥霍天下财富，压榨民脂民膏，长期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在对外征伐的同时，对内又大兴土木，多次巡游，祭祀名山大川，举行封禅大典，这极大地增加了人民群众的赋税、兵役和劳役的负担。到汉武帝晚年，社会危机极度严重。大臣徐乐上疏指出：当时已出现“土崩”之势。汉武帝接受徐乐的意见，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就是征和四年发出的“轮台哀痛之诏”——下诏罪己，改弦更张。正由于控制了贪欲，转变了政策，汉武帝才创造了“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历史。

唐太宗吸取隋朝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毙，其君亦亡。于是，他将自己的欲望控制在不膨胀为贪欲的范围以内。正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历史上才出现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三次农民起义战争是黄巢起义、朱元璋参加并领导的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黄巢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都采取了“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最终都失败了。朱元璋参加的农民起义，在早期，他控制自己的欲望，注意安民，力求兵不扰民，并注意屯田垦荒，恢复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在攻打元大都战役前他做了精心布署，充分发扬了理性精神。朱元璋与众将讨论作战计划。常遇春提出孤军深入直捣元都的战略，朱元璋反对，他认为，孤军深入，一旦元军死守，久攻不下，援军被截断，粮食供应不上，必然产生极大的困难。他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先取山东，撤元军左翼屏障；再取河南，破元军正面藩篱；再攻潼关，除元军右翼屏障；最后，旋师开封，直取元都，“一切形势之地都在我掌握之中”。朱元璋的战略思想，显然是实事求是的，他最终取得反元斗争的胜利。

四、史实求证之二：西欧的崛起和当代世界几件大事

从世界史看，长期以来，西欧是全球最落后的地区，它落后于东亚的中国、南亚的印度、西亚的两河流域、南欧的希腊罗马，以及北非的埃及。西欧走向现代化，是一系列思想启蒙运动，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得到解放，理性得到弘扬的产物。最突出的是强烈的“发展”思想代替了“保守”思想，“再向前去”代替了“休再向前”，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引领西欧发展的潮流，使西欧成为全球最发达的地区。

到20世纪，罗斯福的思想缓解了30年代出现的影响全球的经济大萧条；法西斯纳粹思想以及日本的武士道思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都是摆在人们面前的思想构铸历史的铁证。

五、“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弘扬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都需要加强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历史已经证明，这方面的工作是很困难的。孔夫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培养

人才的成绩是：三千弟子，七十二贤，成才率仅仅是 2.4%。

当今世界更不乐观。学者有下列论述：

“道德教育指向的是人自身，它的主旨在于导人以善，使人在善的、道德的追寻中活得更有意义，与他人、与自然相处得更为融洽和谐，使人得以建构起更为完美、充实的意义世界。

“当代教育的沉痾在于它‘太忙碌于现实，太骛驰于外界（黑格尔语）’。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创造了一个日益发达、丰富的物质世界，它提供给人类各种物质的方便与享受，使得生活更加富裕。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教育，它的主要宗旨就是教人去追逐、适应，去认识、掌握、发展这个外部物质世界，着力于教会人的是‘何以为生’的知识与本领。应当承认教育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正是在当代科技和教育等的影响下，人类驾驭物质世界的知识与能力有了长足的发展。为此人们把当代教育视作当代社会的一大支柱。然而正是在这一历史的行程中，教育逐步丧失它的本真意义。由于它放弃了‘为何而生’的教育，荒废了它在意义世界中导行的职责，不能让人们对人生的意义、生存的价值等根本问题上去认识和改变自己；也必然前提性地要抛弃塑造人自由心灵的那把神圣的尺度；把一切教育的无限目的都化解为谋取生存适应的有限目的。教育也就失去了它本真的意蕴。

“教育的这种‘外在化’的弊病，使人只在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层面去思考问题，去寻找人生的答案，不再去寻求超越于现实利益的生活意义、理想、道德、信仰与终极关怀。人的生活表层化、实利化、短暂化，人对自我的认识和关怀只服从他的逐物的需要，不再去思考那些具有永远意义的价值。人的心灵是空虚的、孤独的、漂泊的。‘物质巨子、精神侏儒’正是当代社会所形成的畸形人格之特征。”（以上见《江苏社科名家文库·鲁洁卷》，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80—181 页）

“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讨论的现象。

目 录

自序 / 001

— 观点探索篇 —

壹 史学方法中“假说”的运用 / 003

贰 实证功夫与思辨精神 / 007

叁 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 / 016

— 思想合力构铸历史篇 —

七律六首（代前言） / 165

壹 思想合力构铸历史——读匡亚明校长“《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 168

贰 思想与政治（一）：神权、皇权、帝王的价值追求与中国皇朝兴亡

——读《秦汉史》、《隋唐五代史》、《太平天国史》等 / 174

叁 思想与政治（二）：商鞅变法与秦国强大——读《商鞅评传》等 / 188

肆 思想与政治（三）：发展思想、战略意志与西欧国家的发展

——读《世界现代化历程》等 / 202

伍 思想与政治（四）：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与苏联、东欧各国的转型

——读《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等 / 216

陆 思想与经济（一）：思想与北美资本主义经济

——读《世界现代化历程》、《剑桥美国经济史》等 / 224

柒 思想与经济（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

——读《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及其在北欧的实践》等 / 231

捌 思想与战争：“一人敌”与“万人敌”

——读《史记·项羽本纪》、《张良萧何韩信评传》等 / 241

玖 思想与廉政（一）：皇权主义与贪腐

——读《张居正评传》、《朱元璋评传》等 / 252

拾 思想与廉政（二）：人文精神与清官——读《海瑞评传》等 / 275

拾壹 思想与学术（一）：“五种社会发展形态”理论与半个多世纪中国史学研究——读《封建论考》等 / 288

拾贰 思想与学术（二）：“律己、育人、笃学”与柳诒徵大师的学术成就

——读《中国文化史》等 / 301

拾叁 思想与社会事业：“人间佛教”与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

——读《大舍无求——证严法师与慈济世界》等 / 325

拾肆 从哲学中吸取史学研究的思想智慧

——读《中国学者心中的科学·人文（科学卷）》等 / 332

— 史实求证篇 —

壹 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发展 / 357

贰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的“仁政”思想 / 373

叁 不同的“皇权主义”，不同的历史结局——洪秀全与朱元璋的比较研究 / 399

肆 观念落后——晚清以降社会全面落后的症结 / 419

伍 清代常州学派的认识论体系和学术影响

——阅读《常州清代文化研究全书》后的认识 / 439

- 陆 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 / 460
- 柒 洪仁玕“革故鼎新”思想的历史价值 / 471
- 捌 “忠王不忠”辨析 / 481
- 玖 张之洞、严复、梁启超与晚清思想启蒙 / 493
- 拾 晚清十年“新政”与“南洋劝业会” / 514
- 拾壹 “三民主义”理论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实践 / 527
- 拾贰 “联邦制”与“联省自治”思潮在中国近代的兴衰 / 548
- 拾叁 俄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党 / 562
- 拾肆 《学衡》杂志与人文主义精神 / 584
- 拾伍 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 / 593
- 拾陆 从连横的诗文看其中国文化情结 / 605
- 拾柒 张謇的事业和他的人生论、认识论 / 622
- 拾捌 尹仲容、李国鼎经济政策思想的若干特点 / 641

— 咏史抒怀篇 —

- 人道与理性——咏史一百一十八首 / 665

- 崔之清 茅家琦先生新著《历史与思想论集》读书笔记 / 705

| 观点探索篇 |



壹 史学方法中“假说”的运用

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思维方法。研究法律的思维方法和研究历史的思维方法就不一样。历史学研究的思维方法主要不是推导的方法、演绎的方法。史学工作者面对一大堆史料，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首先要对每件史料进行分析，去伪存真，从现象入手，深入到本质，然后进行概括，即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评价，总结出他（它）们的经验教训或者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说，历史研究的思维方法主要是分析的方法，概括及归纳的方法。

在分析、概括的过程中，假说方法的运用就十分重要了。可以说，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大量史料的过程就是不断地运用假说方法的过程。

这里所说的假说，指的是探讨、研究未解决的历史问题的初步见解。我不是把已经得到证明的符合历史客观实际的历史研究结论当作假说，这样的结论已经成为真理。我也不是把“自在之物”当作假说，这些“自在之物”是客观存在的。

历史研究过程中运用科学的假说方法大体上有两个阶段。

第一，研究大量史料提出一个结论的过程就是形成假说、修改假说或推翻已形成的假说重新确立新假说的过程。

第二，结论形成了，文章发表了，就作者自己来说，他相信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作者对他自己研究的结论还感到怀疑就匆忙发表，这是很少见的东西。但是，从问题本身来看，他的结论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是否就是真理，一时还不能确定。从这一点说，他的结论仍然是个假说。这个假说能不能变成真理，即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还有待于多方面的检验。这种情况在历史研究中是大量存在的。

假说的方法不仅适用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也适用于史料的考证。例如，关于李自成死的问题，清乾隆时就流传过李自成“禅隐”湖南石门县夹山寺之说。到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对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一事似乎无大疑议，成为定论了。“禅隐”一说被否定了。可是，又有同志根据近年来发现的文物和资料，对“禅隐”夹山寺一说作了新的探索和考证。事实真相如何似有待于讨论。

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人的认识有一个多次反复，逐步深化的辩证发展过程。一次认识就达到真理，这是不可能的。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同样有这样一个多次反复，逐步深化的过程。因此，把历史研究中得到的初步结论视为一种假说，以待日后的检验，并逐步修正，使它逐步接近真理，我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也可以说，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科学的假说方法，实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和运用。

二

究竟靠什么东西检验历史研究中的假说能否成为真理呢？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两条：

第一，要看以后陆续发现的史料能否继续证明已经提出的假说的正确性。

第二，要看我们是否正确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研究历史的结果自然经得起检验。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停留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水平，那么，我们势必要认为

历史上所有的文化艺术都是剥削阶级的文化艺术，都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因而，不能继承它们的艺术内容，只能批判，可以继承的只是某些艺术形式。这显然是错误的。

由此可见，历史研究中的“一言堂”是十分有害的。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文章自封为绝对真理。任何一种假说，总需要经受各种检验，看它能不能成为真理。“百家争鸣”就是最终取得真理的必要手段。通过百家争鸣，相互切磋，取长补短，逐步修改已经形成的假说，它才能逐步接近真理。没有不同意见的百家争鸣，其结果只能是把假说当成真理，阻塞历史研究发展繁荣的道路。这就是说，从方法论上看，从认识论上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也必须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

三

当我们提到“假说”方法时，很自然地想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们认为，历史研究中科学的假说方法和胡适派的思维方法有本质的不同。

我们提出的假说是从大量的、可靠的史料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得出的试探性的结论。虽然我们把它看成是有待验证的假说，但从作者来说，他提出这个试探性的结论总要经过认真的深思熟虑的研究，并认为它是正确的。所以，史学工作者提出假说必须遵守两个原则：一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思想；二是必须占有大量的、可靠的史料。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假说要从大量史料的研究中形成，从这一点说，我可以称之为“论从史出”。对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我们如果理解为可以主观地、大胆地“臆造”出一个假设，然后找材料来证明它，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历史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可以由人们任意地涂抹、打扮，历史是几十个大钱，可以由人们任意地摆弄，这就错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把“大胆”理解为要有理论勇气，要有勇气建立假设，并勇于承认自己的论点

是假说，不是绝对真理，那么提“大胆的假设”还是不错的。

我们不能因为批判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唯心主义方法而否定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假说方法。